從「多少中國滄桑」談起

許家石

一九三一年，普立茲文學獎得獎作品，是賽珍珠所寫的「大地」，在這本有關中國的小說裏，其中的一段描寫，賽珍珠敍述一個大戶人家的丫頭，在因爲兵亂以致懷孕之餘，如何向他的主人——王龍，要求獲得一位丈夫的希望，這個丫頭的情況，或者說是賽珍珠式的情況是這樣的：

「那受了孕的丫頭，王龍命她在他嬸母還活着的期間當值她，等她死了，送她進棺材，那老婆子的房間，她若喜歡，就可以做她自己的房間，那張床也歸她，他又給她幾塊洋錢，這女人除了一樁事以外是十分滿足了，她告訴他：

『就拿這洋錢給我當嫁妝罷，老板呀。』她說：『如果你不怕麻煩，請你將我嫁給一個種田人，或者一個好一點的窮人也行，你做做好事吧，我既然和男人住過了，就已經不習慣獨宿了。』」

一九三一年的普立茲文學獎，頒給了賽珍珠，此後的諾貝爾文學獎也頒給了賽珍珠，由於她對這個古老東方民族的忠實描敍，而不是由於她在文學上的成就——這種說辭的確很合理，賽珍珠的文學成就到底是什麼呢？沒有人能够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只能比較她與海明威，比較她與辛克萊・路易士以致比較她與費滋傑羅。

而關於賽珍珠對中國的描述。不妨讓我們看看「多少中國滄桑」這本書中，作者雷蒙・道森的說法：

「在所有以中國爲背景的小說中，論其讀者羣和影響力，要數賽珍珠的「大地」爲其個中翹楚，該書在一九三〇年代發行以後，一時洛陽紙貴，它描寫一位貧苦的佃農王龍，從窮困中出人頭地的故事。基福列•哥勒認爲這本書所以能在美國風靡一時，乃是由於書中描寫王家從私人企業的經營中，所獲致的社會地位和經濟進步，以及他們在艱苦的創業過程中，家庭所遭遇的困難和不睦，頗能教美國人想起當初自己創業的經驗。換言之，這本書所以能引起他們的同情，因爲該書所描寫的內容，與他們的生活十分接近，由「大地」這本書的暢銷，我們似乎可以發現，有關中國的小說，其暢銷與否，並不在它是否能够精確地描寫出中國的背景，而在它是否能够包含西方讀者所熟悉的主題。」

對照「大地」的內容，以及雷蒙•道森的說法，我們發現，美國讀者接受「大地」這本小說，不僅是由於題材的熟悉，也由於對書中角色的人格及行爲方式的熟悉。事實上是，賽珍珠筆下的中國社會，嚴格講來，只是一個美國模式的中國社會，而賽珍珠筆下的中國人，關於那個明白要求性與婚姻解放的丫頭，實際上，她的眞正名字，應該是海明威在「戰地春夢」的凱撒玲，德萊塞在「天才夢」中的露比，或者是密眞爾在「飄」裏所創造的郝思嘉，不管怎樣，只要賽珍珠答應給這個丫頭一個名字，比如安琪或克麗絲汀。那麼「大地」這本書，不折不扣，就是一篇美國式的寫實主義小說。

這樣一篇文學技巧及理想都十分下乘的小說，何以竟能在美國社會獲得如許的轟動呢？主要是因爲書中主角名字叫王龍的緣故。「大地」的成名，帶來令我們中國人爲之坐立不安的心酸，假如這是一篇中國式的小說，「大地」就永遠得不到普立玆獎。假如這是一篇美國式的小說，「大地」也依舊永遠得不到普立玆文學獎。但是，當「大地」以中國人作題材，表現出美國人所慣有的行爲反應與文化方式時，普立玆獎便頒給這個表面陌生但却熟稔的作品了，頒獎的意義，純粹是對美國文化的認定，而並非對中國社會的同情及了解，在這裏，很明顯地，包括賽珍珠在內，美國人所認識的中國，只是一個綴有中國姓氏的美國式中國而已！

那麼，德國或法國人眼中的中國是什麼模式？而

自從十二世紀以來，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又是什麼模式呢？

這個問題，讓雷蒙•道森在「多少中國滄桑」這本書中回答好了！

「多少中國滄桑」是一本對最近七百年來，西方人在認知中國社會過程之餘的總檢討，或者說，它就是一本「西方人眼中的中國」的翔實紀錄，在全書八章之中，除了第一章變色的蜥蜴以外，從第三章天府之國，到第三章耶蘇會與中國，是檢討自從馬哥孛羅以來，以迄鴉片戰爭以前，西方世界對東方中國所持有的看法，集合這些看法，其中充滿了羨慕與憧憬之情，但是對比這個時期的西方歷史又是什麼面目呢？從十三世紀開始，蒙古大軍橫掃東歐，隨後的西方世界，雖然在蒙古的鐵蹄下漸次甦醒，然而整個歐洲，依舊四分五裂，國家與國家之間對壘，而國內則統治階級壓制並且剝削農民，文藝復興固然在隨後的兩百年間，爲歐洲的歷史，寫下眩目的一頁，但是民主制度，仍然，遙遙無期，海外的殖民行爲，由於受到國內反抗統治階級風潮的掣肘，只能在美洲或無人島嶼進行，產業革命剛剛萌芽。總而言之，這個時期的歐洲社會，由於各種問題叢生，因此仍然貧弱不振，東方中國，對久處黑暗及戰亂中的歐洲人而言，無異是一個天府之國，所以，此時西方對中國的看法，懷有一種宗教的期望在內，雷蒙•道森說：

「於是，西方人開始把他們的期望轉向東方，人們必然都還記得，中世紀的「宇宙誌」，曾把「地上的天堂」，描寫在地球的極東之區，創世紀中就說，上帝在伊甸之東建造了一座園子，這對於那些教父學派的地理學家，自然是一個極大的誘惑。」

這個時期西方人對中國看法，實際上是把中國視爲一個聖地。一個西方文化的救世主。

然而隨着西方文明的進展，西方人開始調整他們對於東方世界的看法，這裏值得我們重視的是，在西方對東方的全部認知過程中，不論學者抑或一般西方民衆。他們認知的基礎，完全是建立在根據本身文明條件所形成的世界觀之上。換而言之，認知的對象——東方世界如何變化，並非西方人在認知過程中的關鍵，而是西方世界如何變化，帶動了他們對東方的皮相看法——一種賽珍珠式的認識論。實際上，主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。

「多少中國滄桑」從第四章「永恆靜止的民族」以迄第七章「異教的中國」。基本上，是透過比較文化的方法，重新檢討了西方人在認識中國的這條路上，所形成過的幾許錯誤！這些錯誤，延擱了東西文明交流的時刻表，這是人類自古以來，恆常發生的悲劇之一，由於文化的歧異，所引致的文化的偏見及不瞭解，使世界上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與另外四分之一人口，彼此之間，行同陽關道與獨木橋。

而世界文明發展的步調也因此緩慢了下來。

檢討十八世紀以後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，其中充滿了種族、科技、宗教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歧視在內。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，因爲自從十八世紀以來，中國社會的變遷差異性很小，何以西方人對這個變遷極小的社會的看法，短短百年之間，竟有如許的出入。

關鍵在於產業革命，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與民族主義，到了產業革命以後，由於財富的屯積及政治的擴張，已經被新興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替代，這是一種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大轉變，由此而後的西方社會，緣於科技的成就，開始睥睨四方，革命以前的東西文化交流，基於一種溫和的瞭解，而革命以後的東西文化交流，則乃是戰爭與征服之餘的附帶行爲，這種差異性，特別顯示在宗教這一方面，在「多少中國滄桑」的第七章「異教的中國」裏，雷蒙•道森作了以下的說明：

「早期的新教教士（按：指十八世紀後的英國基督教會保守主義者）視中國爲一異教的國家，缺乏上帝的光明引導，他們想把中國自萬劫不復的境地中解救出來……他們這種陰鬱的看法，與耶蘇會教士（按：指明末的利瑪竇所屬教會）的人道主義，實有天壤之別，後者深信非基督教世界亦有得救的希望……新教教士則缺乏耶蘇會教士的胸懷和高深的科學學養，他們心胸狹窄，觀念保守，缺乏想像力。」

十八世紀以後，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，和他們早期傳教者利瑪竇等，在觀念上的最大不同，在於後期教士把中國視爲一羣異教徒的邦國。明顯地，這是一種當時帝國主義的西方强權政治中，所產生的一種帝國主義式的宗教觀，湯恩比在歷史的研究裏，以「基督教文明」這個名詞，統屬整個西方文化的內涵系統，因此，當西方政治走向殖民式的帝國主義路線時，基督教士跟着也忘懷了宗教的最終精神，乃是基於

一種偉大的寬容，而亦步亦趨走向帝國主義化的宗教概念，也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！

當基督教以本身標準，死守聖經教條而不究其眞正教義地把其他宗教視爲異教時，基督教本身又算是一種什麼宗教呢？

十八世紀以後，西方教士到中國傳教的行爲，用雷蒙•道森的說法是：他們把中國視爲一個征服的對象，而不是了解的對象，他們未曾運用他們的想像力去瞭解中國人，只是洋洋自得地深信，中國人沒有改良的希望，他們可望被基督教解放，快樂的生活在基督教的影響下。

傳教士的態度，反應出十八世紀以後，西方人看中國的基本態度，事實上，這種態度，西方人不僅運用於中國，也同時運用於非洲大陸，美洲土著以及印度與阿拉伯世界之間。

女人類學家本尼狄克在她所寫的著名作品「文化模式」這本書中，曾經說過以下的一段話：「任何社會規律都有其目的，以婚配與生育爲例，瀕海戴亞克族的婚配及生育習俗，雖然與我們的文明沒有絲毫歷史關聯，但絕不因此就減少其重要性，對人類學家來說，我們自己的風俗與某一新幾內亞部族的風俗，在功能上，乃是解決同一問題的兩種可行的社會制度，如果我們對兩者的判價值斷有高低之分，我們立刻就喪失了人類學家的資格。

距離本尼狄克寫下這本「文化模式」四十年後的今天，由於文明的繼續開拓，我們可以將本尼狄克那句「喪失了人類學家的資格」的話，重新修正爲「喪失了人類的資格」。的確，透過幾千年來的戰爭與苦難，巔沛以及流離的歷史痛苦教訓之後，人類有必要重新檢討他們面對不同文化行爲之際，所應該採取的正確反應態度。即使文化的寬容遠比文化的瞭解更不容易。然而爲了一個更好的明日世界，人必須努力朝這個方向走。「多少中國滄桑」這本書，已經檢討了文化歧視的錯誤，以及這種錯誤所帶來的深遠影響，但是讀完這本書後，我們所應該從事的另一角度內省工作，則是：當西方世界以他們的世界觀來詮釋中國之餘，我們中國人，是否也曾經並且還在繼續地使用我們熟悉的世界觀，同樣地去詮釋着西方的世界呢？

從春秋以迄秦漢，我們視自己國家居天下之中，而稱之爲中國。至於其它國家的人，則分別被儒家學

者冠以蠻夷之民——這樣一種民族與政治的歧視的態度，我們不僅有過，而且有過將近一千五百年之久。一直到鴉片戰爭以後，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識態度，方才由於本身文化無以成功反應西方文明的挑戰，而一改爲自卑無已，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，從此橫亙在滿頁屈辱的近代史跡之中，有誰能够解釋這種歷史上的痛苦矛盾呢？

「多少中國滄桑」中，作者雷蒙・道森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但是讀了這本書，並且回憶過近百年來中華民族悲慘影像的中國人，却不能不設法努力回答這個問題，因爲民族的自尊，是建立於彼此間在文化上的寬容，而不是建立在某一方對另一方的遷就或同情之上。

仙人掌雜誌

思想的・社會的・生活的・藝術的

仙人掌爲未來的中國找出方向

第三號　五四的信息

周策縱／五四運動的闡釋與評價
呂亞力／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
汪曾才／民主的興起與演變
胡鴻仁／民主沒落了嗎？
蔡仁堅／科學的價值就是人的價值
孫慶餘／科學在現代化過程扮演的角色
陳勝崑／醫學中文化——近代醫學本土化的呼籲
郭正昭／嚴復與近代中國
李永熾／清末知識份子與民衆
顏清洋／東漢知識份子與政治
毛　倫／明季知識份子的救國運動
林　梵／楊逵傳第一章
鄭石岩／教室暴行的心理分析
胡汝森／從黑人牙膏談起

仙人掌雜誌社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96巷12—2號（2樓）
電　話：7073893　7057881
郵撥帳號：109179
定價55元，零售45元，半年訂戶六期：240元

仙人掌爲現在的中國提出檢討